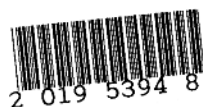


中国哲学家论点彙编

第 二 冊





2 019 5394 8

中国哲学家论点彙编

第 二 冊



目 录

两汉哲学·····	1
一、两汉哲学的社会基础·····	1
二、两汉哲学的思想背景·····	8
三、两汉哲学发展的大势·····	13
陆 賈·····	20
一、陆賈及其《新語》·····	20
二、陆賈的道基论·····	21
三、陆賈的政治思想·····	25
四、陆賈的知行论·····	29
賈 誼·····	32
一、賈誼及其《新书》·····	32
二、賈誼的道术论·····	34
三、賈誼的人性论·····	42
四、賈誼的政治思想·····	46
五、賈誼的知行论·····	59
淮南子·····	63
一、淮南王刘安和《淮南子》·····	63
二、淮南子的宇宙观·····	65

三、淮南子的历史观	76
四、淮南子的人性论	85
五、淮南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92
六、淮南子的知行论	107
董仲舒	117
一、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	117
二、董仲舒的天道观	119
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	126
四、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132
五、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136
六、董仲舒的历史观	147
七、董仲舒的知行论	151
刘向	154
一、刘向的生平和著作	154
二、刘向的天人感应论	157
三、刘向的政治思想	161
四、刘向的知行论	170
桓宽	178
一、桓宽及其《盐铁论》	178
二、桓宽的天人感应论	183
三、桓宽的人性论	185
四、桓宽的政治思想	187
五、桓宽的知行论	193

扬雄	196
一、扬雄及其《太玄》和《法言》	196
二、扬雄的宇宙观	199
三、扬雄的历史观	206
四、扬雄的人性论	208
五、扬雄的政治思想	210
六、扬雄的知行论	216
桓谭	223
一、桓谭及其《新论》	223
二、桓谭反迷信	225
三、桓谭论形神	228
四、桓谭谈政治	230
五、桓谭谈知行	234
白虎通	236
一、《白虎通》一书的由来	236
二、《白虎通》的天人合一论	238
三、《白虎通》的三正三统说	244
四、《白虎通》的性情寿命论	247
五、《白虎通》的神学知识论	250
王充	252
一、王充的生平及其《论衡》	252
二、王充的天道观	256

三、王充的社会历史观	272
四、王充的性命论	282
五、王充的知行论	293
王符	304
一、王符及其《潜夫论》	304
二、王符的天道观	305
三、王符的历史观	309
四、王符的人性论	311
五、王符的政治思想	315
六、王符的知识论	323
荀悦	326
一、荀悦及其《申鉴》	326
二、荀悦对迷信观念的批判	327
三、荀悦的性命论	328
四、荀悦的法教论	331
五、荀悦的知识论	336
仲长統	338
一、仲长統及其《昌言》	338
二、仲长統的天道观	339
三、仲长統的历史观	341
四、仲长統的人性论	344
五、仲长統的政治思想	345
六、仲长統的人生观	349

两 汉 哲 学

一、两汉哲学的社会基础

(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秦完成了灭掉关东六国的事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正式承认了土地家族私有制度,于始皇31年“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政治上实行了全国统一的郡县制度,划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又增设九原、南海、桂林、象郡,陈郡、東海共四十二郡。同时还改变了“田畴异亩、車途异軌、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語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促进了这些方面的統一。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适合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的,实际上打下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

(二)可是,秦灭六国的事业不是在农民反对本国沒落領主的起义中实现的,也不是通过“弔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实现的,而是通过残暴的兼并战争实现的。这种兼并战争扫除了反抗国家統一趋势的六国沒落領主,这是积极的;但也侵犯了六国沒落領主压迫下的新兴地主和农民。在灭掉六国以后,秦朝統治者又没有采取团结一切拥护新制度的阶级、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却采取了横征暴斂、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它沒有爭取到地主的

拥护，也沒有爭取到农民的默认，因而就使自己陷于孤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的路上死掉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就一起暴发了。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先揭起了农民起义的旗帜。接着，六国領主的余孽，新兴地主，都起来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来反对秦朝的統治。这就是所謂“山东豪傑竝起而亡秦”。在各种力量的联合打击下，秦朝在前206年灭亡了。秦始皇原来的打算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計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結果却是传至二世共一十五年，就被人推翻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起义，为后世农民树立了榜样；秦朝的暴兴暴亡为后世封建統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三）秦末“中原逐鹿”的斗争实际上是三种力量的斗争。以陈胜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力量，由于在政治上軍事上都犯了重大錯誤，很快就失敗了。以項羽为代表的残余領主力量，不久也失敗了。結果是代表地主、利用农民的刘邦集团，在前202年刘、項垓下决战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刘邦胜利以后，建立了西汉王朝。从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基本上是中央集权，在某程度上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的新时期。西汉王朝实际上是秦朝事业和制度的继承者，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家公认的“汉承秦制”或“汉踵秦制”。只是，它是经过一次巨大的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又借鉴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所以沒有重蹈亡秦的复轍，而采取了一套比較合适的政策，取得了农民的默认，巩固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地主阶级基础，从而就稳定了自己的統治。

（四）西汉时期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①封建地主阶级

(包括皇帝、贵族、官僚、豪强和庶族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这是最基本的矛盾。整个地主阶级是压在农民身上的,对农民起义他们是一致反对的,但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又主张采取稍有不同的政策。②封建皇帝中央集权和封建贵族(包括异姓和同姓贵族)和地方割据的矛盾。这个矛盾有时暴发为战争。③豪强中两个主要集团——商业豪强和土地豪强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往往表现为“本末”之争。前者倾向“逐末”——发展商业和奢侈品工业,后者主张“强本”——巩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保障封建剥削。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皇帝往往利用他们的互相攻击来谋自己的利益。④庶族地主和豪强的矛盾。在西汉时代,社会上还残留着大量的奴隶制残余,封建豪强,特别是大商业豪强,大都直接剥削奴隶劳动,兼有奴隶主的身分。中小地主也受他们压迫,往往以人民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依附于某一官僚集团,和他们进行斗争。这些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只有分析了这些矛盾的错综发展,西汉王朝的稳定、兴盛和衰亡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五)西汉历史的发展可以说经过三个时期:①前期:前202年(刘邦即天子位)——前141年(汉景帝死),中经惠帝、文帝,共62年。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采取了“休养生息”和“重本抑末”的政策,减轻赋税、奖励开垦。这在形式上是“惠农”,实质上是保护地主利益。国家抽税是十五税一以至三十税一,得利者是地主;而农民则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成功地翦除了地方割据的力量。刘邦时期,异姓诸王相继被削掉了,前154年,汉景帝又削平了同姓七国之乱,稳定了中央集权

制度。在这一时期，自公元前200年刘邦在平城之役失利以后，就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取得了北边的暂时安宁。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适合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也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这为中期的强盛打下了基础。②中期：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前49年（汉宣帝死），中经昭帝，共92年。在这一时期，两汉王朝还是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汉武帝时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前109年堵塞了黄河决口，晚年又推行了赵过的代田法和耦犁、耨耨等新式田器。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煮盐、冶铁等工商事业也有了发展。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的辩证法，在西汉王朝“重本抑末”的政策下，工商业发展、豪强兼并却成了不可遏止的趋势。可是，这时西汉社会表面上还是兴盛的，汉武帝凭藉长期积蓄的国力，大事对外战争，伐匈奴，出西域，大大扩张了王朝的版图，显示了王朝的威力。但这在国内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豪强的兼并，使扩张政策难于为继。为了充裕国库，支持战争，汉武帝依靠大商人将煮盐、冶铁、铸钱三大行业收归国营，给地方豪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这引起了“丞相大夫”和“贤良文学”的长期争议。他又依靠“酷吏”对被迫起义的农民，还有某些不法的贵族、豪强，实行极端残酷的镇压。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这位皇帝死前不久下了一道悔过的诏书，表示他的“雄才大略”已经无法付诸实施。后来所谓“宣帝中兴”，不过是勉强维持一个强盛的外表而已。③后期：前48年（汉元帝即位）——公元8年（孺子婴初年），中经成帝、哀帝、平帝，共56年。在这一时期，朝廷之上，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官僚励行兼并。朝廷之外，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励

行兼并。农民在沉重的剥削压迫下，陷入破产，大批沦为“徒附”，有些甚至卖身为奴，盛极一时的西汉王朝至此陷入了不可挽救的危机。

(六)在西汉王朝危机四伏的时候，外戚王莽在公元8年篡夺了政权，建立了新朝。王莽企图用欺骗的手段来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开始，他颁布了改民间田为王田，民间奴婢为私属、均不得买卖的禁令，想以此来阻止兼并的趋势，缓和农民的斗争。后来，在豪强势力的联合反对下，他又取消了这一禁令。结果，他得罪了豪强，又没有留住农民。公元10年，他又实行所谓“五均”（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六管”（官卖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币，五均除货等），在“齐众庶，抑兼并”的名义下，和商业地主争夺压榨农民、手工业者的权利。同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于对外，他又在“讨伐”匈奴的名义下，于公元10年、19年两次征募士卒、屯兵塞上，而又不接济粮餉，让这些人在边疆上饿死、冻死或战死。于是，一切矛盾都集中在王莽身上暴发起来了。反莽的主力军是农民。公元17年，荆州暴发了新市、平林的起义。公元18年琅邪东海暴发了赤眉军的起义。稍后，北方暴发了铜马等军的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军没有远大的战略，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统帅。赤眉军攻下了长安，却忙着还乡归田。结果，西汉宗室、南阳豪强刘縯、刘秀乘机利用南方起义军的力量，在“讨莽复汉”的名义下，推翻了王莽，又一个个地消灭了农民起义军，夺取了胜利的果实。就这样，王莽的新朝成了腐朽的西汉王朝的替死鬼，刘秀集团又在新莽王朝的灰烬中建立了东

汉王朝的統治。

(六)东汉王朝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西汉王朝的继续和发展。社会的基本矛盾,本质上并没有两样。突出的特点是,地主阶级中生长出来的豪强势力,不论在朝在野,一上来都更为强大,而且也更为荒淫无耻。在朝,依附皇权的外戚和宦官,逐渐发展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左右中央政权。在野,仍然是商业高利贷者和大地主这两类豪强。他们都大规模地兼并土地,招收“徒附”。乡村大地主更逐渐形成所谓“名门士族”,武断乡曲。这在朝在野的两种对立的力量,纵横捭阖,相互斗争。一般说来,宦官偏于和商人高利贷者相勾结,外戚则偏于和士族相依托,形成了两大敌对的势力。他们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得到了同归于尽的结局。在这两大势力的轮流统治下,东汉劳动人民的地位是更为困难了。尽管他们在西汉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例如广泛使用了牛耕,整治了黄河,开采了火井和石炭,发明和使用了水排、耙车、水碓,发明了造纸(公元105年造成了“蔡侯纸”),但结果只是供养了穷奢极侈的皇族、宦官、外戚、官僚以及遍地的豪强,他们自己却日益陷入几乎同于农奴以至成为奴隶的境地。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支持住两大势力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政治舞台,也以自己的斗争促成了这个舞台的倾覆。

(七)东汉王朝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①前期:公元25年(汉光武帝即位)——公元87年(汉章帝死),中经明帝,共64年。公元36年,刘秀实现了全国统一。由公元26年至38年,他先后下了七次释放官私奴婢的诏令,多少起了限制豪强兼并的

作用。但刘秀集团本身原来就是地方豪强,又依靠着地方豪强,所以自始就不敢触动豪强的利益。公元39年,他下詔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意在增加中央政府的剥削对象。但这并没有打击到豪强,却侵犯了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激起了民变,结果是杀了几个地方官了事。东汉王朝的统治自始就是豪强的统治。

②后期:公元89年(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中经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共96年。在这一时期,外戚和宦官展开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起初外戚是得势的。公元88年,汉章帝死,窦太后临朝,宣布“罢盐铁之禁,任民煮铸”,以争取地方豪强的拥护,可以说是争夺战的开始。此后相继出现了外戚邓氏、阎氏、梁氏的专政。他们一个个都被宦官利用外戚与皇族的矛盾阴谋诛杀了,宦官也就越来越得势。在桓帝、灵帝时期,以窦氏为首的外戚集团,与官僚、士族合作,同宦官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士族自认为“清流”,谓宦官集团为“浊流”,对朝政发表“清议”。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宦官集团反击,兴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杜密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公元168年,窦武、陈蕃与官僚密谋尽诛宦官。宦官中常侍曹节、王甫却先动了手,矫诏杀了窦武、陈蕃,幽禁了窦太后。公元168年(灵帝建元二年),中常侍侯览兴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死了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名士六七百人被“禁锢”,太学生一千余人被捕,内外官职全部落到宦官集团手里,东汉政治于是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境地。

③末期: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220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共三十年。东汉王朝后期的腐败统治终于酿成了公元184年以张角为首、以“太平道”为旗号

的黄巾大起义。东汉统治阶级——皇族、外戚、宦官、官僚、豪强一起起来镇压黄巾起义，同时仍然进行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结果是，黄巾起义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也两败俱伤了。先是宦官张让等“十常侍”杀死了外戚何进，后来以袁紹为代表的士族豪强又尽杀了宦官。此后即进入了豪强争霸、三国分立的时期。

(八)总结秦亡以后至三国时期的历史，是三次农民战争中间夹着两个王朝的历史。本质上，这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地主阶级的敌对集团争夺对农民的最高剥削统治权的历史。农民这个阶级不能建立自己阶级的政权，也不能建立自己阶级的思想体系。但他们是当时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们的向背、斗争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命运。能够取得农民拥护或默许的，就可以取得或保持政权；为农民所诅咒、反对的，就一定要灭亡。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两次农民战争之间，是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一乱一治、曲折前进的周期。

对农民的态度，是我们判别地主阶级各个集团以及它们的哲学上的代表为进步、为反动，为“清流”，为“浊流”的试金石。

二、两汉哲学的思想背景

(一)两汉王朝都是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而建立起来的地主政权。真正的当权者，在中央是皇帝周围的宦官、外戚、大官僚，在地方则是从商人、地主中生长起来的豪强势力。这些人所

能使用的統治手段，第一是刑名家的权术，第二是讖緯家的迷信，此外都不过是点綴和裝飾。关于汉家的崇尚权术，汉宣帝刘詢有一番精彩的谈话。当他的太子婉言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时候，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并且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一段谈话泄露了刘汉“家法”的秘密。“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表面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决定者，实际上他的得力助手是桑弘羊、孔僅等一帮“財官”和张湯、赵禹、宁成、王溫舒等一群酷吏。至于汉家的崇尚讖緯，那可以说是从刘邦开始。刘邦在起义之始，就靠关于“斬白蛇”的故事来愚弄将士和人民。汉武帝刘彻的宫庭，就有一批专为他炼制长生不死之药和招神致鬼的方士。衣鉢相传，到刘秀就更广泛地利用了图讖。他的即皇帝位，就利用了讖語。公元56年，更頒布图讖于天下，决定国家大事也要采取查問图讖的形式。終两汉之世，朝庭之上都利用“符瑞”和“灾异”来进行政爭。天、神、鬼的統治，在殷周之际和周秦之际，曾遭受了两次动摇，不少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思想家成了存疑论者以至无神论者。现在，在地主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却又利用天、神、鬼来加强自己在人間的統治！然而，两汉的时代究竟是经过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是经过了諸子百家爭鳴的时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状况都不能返回过去，都使統治者不能简单地利用权术和迷信来統治。于是，两汉的統治思想就不能不采取学术思想的形式。

(二)两汉統治思想的形成首先经历了一个由“崇尚黄老之

术”到“独尊儒术”的阶段。原来，在两汉初期，统治者鉴于亡秦焚书坑儒政策的失败，采取了对諸子百家兼容并包的政策。刘邦本人就曾利用纵横家酈食其、辯士陆賈来为他游说；取得政权以后，又利用儒者叔孙通为他“定朝仪”。孝文帝爱好刑名家言，孝景帝的“智囊”晁錯就是一个学“申商刑名”的法术之士。但由于适应长期战乱以后的休养生息的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较得统治者赏识，因而取得了事实上的优势。两朝初期的名臣如曹参、陈平都“师黄老之术”，景帝的母亲竇太后更是黄老家的靠山。当时朝庭上学派的对立主要是黄老家与儒家的对立。随着王朝历史发展的进入中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就显得不够用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有为之治”需要有更合适的理论根据。适应这一需要，就有了儒学的兴起。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武元年），“詔举賢良方正極言敢諫之士，上亲策問之”，选拔給《公羊春秋》的儒者董仲舒为江都相，并且批准了丞相衛綰“所举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請皆罢”的奏议。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元光6年），又置五经博士，把儒学抬高为官学。公元前130年，“徵吏氏有明当之务、习先圣之术者”；齐州人公孙弘对策，“天子擢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马門”。从此以后，利用儒经来綴飾时政就成了一种风气。这些事件的总名称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示两汉统治者利用“儒术”进行思想統治。

（三）西汉时期在“儒术”的旗号下兴盛起来的儒学是所謂“今文经学”。这种儒经是用秦汉以来通行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其特点是：把阴阳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結合起来，編

造了一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论，既能和两汉统治者对于图讖、符瑞、灾异的迷信相投合，又能以“任德不任刑”的儒家传统作两汉统治者“内法外儒”政策的装饰。这个学派最拿手的一《经》是《春秋》，特别是《公羊春秋》。他们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指导思想，对《春秋》的“微言大义”作出万分神秘而又实有所指的解释，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个学派，经武帝的扶植，又经宣帝主持的石渠阁会议（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3年）“讲五经异同”，而达于极盛。结果是流为极端的庸俗、烦琐，甚至公开和讖緯合流。这般今文经学的腐儒，各自尊奉祖师的“家法”，解释《五经》章句，动辄几十万言以至百万言。后来连迷信图讖的皇帝王莽、刘秀都感到厌弃。于是，今文经学的发展便不能不由盛而衰，为所谓“古文经学”所代替。

（四）所谓《古文经》，据它们的创始人说，是用周代籀文写的经。经近人考证，实际所用的是为秦朝所废除的六国文字。汉史记载，武帝天汉年间，孔安国献《古文经传》，藏于秘府；又河间献王得《古文经传》，献于朝。这些记录标志着“古文经学”争取官学地位的开始。但在这时候，《今文经》的合法地位已经奠定了，所以《古文经》除了在民间流传以外，在朝廷只能被“藏于秘府”。西汉末年，随着今文经学的日趋庸俗、烦琐，由盛而衰，古文经学家刘歆就与太常博士争立古文《尚书》、《逸礼》、《左传》。刘歆得王莽赞助，《古文经》一时得势。王莽失败，东汉代兴，五经博士仍按西汉旧制，用《今文经》。汉光武帝曾设立《古文经》，也因今文经博士及公卿群起反对，所立《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但今文经学的地位并未因此巩固，古文经在民间有了越来越